

酷儿全球化 / 女性情欲乌托邦

猫儿噤声的妈妈国：

《她乡》的白种女性禁欲想像

丁乃非原著

刘人鹏译

所有我们的女人牺牲奉献给她们个人的家庭的，这些女人都奉献给了她们的国家与种族，所有那些男人期待于女人的忠心与服务，她们不是仅仅给予男人，而是彼此互相给予。（夏绿蒂·柏金斯·吉尔曼，《她乡》，页 167）¹

这篇属性不明确的文章，完成于 1997 年 10 月。当时，女书店负责人好几个月前邀约我写一篇介绍〈黄色壁纸〉和《她乡》的文字，为女书店即将出版的《她乡》作序。我那时看的是原文的（她乡），立即觉得有必要在序文中提出这篇小说在我读来，一片女性建国的异象中惊心的文化、种族、性的阶级偏见及历史烙印。也就是说，女性建国的「女性」到底是依何时何地哪些社会、经济、种族、性欲望条件的性别想像而来，非常重要。尤其是身处当时台北的女性主义和妇女运动的氛围。小说的偏见处处验证了台北女性主义和妇女运动当时的一些结构和历史盲点。在小说中，这种偏见可以见诸叙事结构、情节布局，也存在于小说叙事的留白与字里行间。而

¹ 本文阅读分析，引自小说原文（*Herland and Selected Stories by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ed. Barbara H. Solomon, New York: Signet, 1992），翻译则引自女书店出版的忠义本（《她乡》，夏绿蒂·柏金斯·吉尔曼作，林淑琴译，台北：女书，1998）。

台北国家女性主义 / 妇运的论述偏见，我已在另一篇文章中做了初步的分析。²在被邀约写序的当时，只觉得必须将《她乡》的宏观异象与台湾现实环节中女性主义阵营和论述的转型发展连结起来阅读。因为，女书店在那时，以《她乡》作为书的首篇，又是书的名称而计画出版，我以为具有女性主义、性别政治的意涵。这种意涵可能的未来路径，正如小说的异象一样，应当可以在序中阐述，作为出版中译本较为脉络化的、（自我）批判性的阅读。遗憾的是，交稿后，电话告知这篇文章不适合作序。后来，这篇文章连同白瑞梅（Amie Parry）对于《她乡》的酷异变奏，一起在 1997 年 12 月中央大学性 / 别研究室、清华两性与社会研究室、桃社合办的超薄型研讨会中发表，并由刘亮雅和朱伟诚回应。1998 年 5 月，本文以书评的面貌，刊登于《当代》第 129 期（1998/5/1）。为重现去年超薄型研讨会的原貌，这次性 / 别研究期刊决定将两篇论文加两篇评论一起刊登。本文的更动主要在增加了注脚和书目。³

² 亦可参见《当代》第 127 期，1998/3/1，〈「妇女新知」家变事件〉。

³ 本文得以完成，过程中的许多讨论和资料，特别感谢刘人鹏和白瑞梅。1997 年 12 月 20 日，性/别政治超薄型研讨会【女性乌托邦的性别政治】中，刘亮雅的评论以及在场许多朋友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本文读法提出的部份问题和论点，写成后得知，在 1993 年张惠娟的专题论文〈典范兴替——论吉尔曼的《她之乡》〉（第三届美国文学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选集：文学篇，单德兴主编，台湾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3，205-207。）张小虹所作的评论中已经提出近似观点：「如果女性主义的一贯立场乃是反霸权、反父权、反宰制、反垄断，那女性主义阅读似乎必须具备自我解构与自我颠覆的能力；如果经典的概念必引发一连串包含 / 排除之过程，那我们就必须回过头来想一想《她之乡》作为经典或对抗经典时所压抑与排除的异己。……此外，还可质疑吉尔曼再对性别与阶级的关注的同时，是否也压抑了其作品中其他少数团体——如犹太人、黑人及移民——的权力？」。

夏绿蒂·柏金斯·吉尔曼的中篇小说《她乡》(1915), 以及她早期更著名的短篇故事〈黄色壁纸〉(1892) 于 1997 年秋天在台北的翻译及 1998 年春的出版, 对于台湾在地的妇女运动以及女性主义论述来说, 是正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上。二篇作品在本书一块儿出现, 若以它们原初写作的时间顺序来阅读(而不是以它们在本书翻译中的次序), 吉尔曼在美国世纪之交所写的这两个故事, 可以看成一则寓言, 写的是异性恋父权婚姻机制如何是个去乌托邦(dystopia), 逼得女人(作为囚禁的家庭/主妇)发疯, 而她乡却是个神话式的乌托邦, 在那儿男性访客退化到心理上倚赖与满足安分的幼儿状态, 结果是女性化或被放逐, 而女人则快乐地君临天下, 那是一个达到秩序与美丽颠峰的国度, 居住着理性理智的母亲, 而没有性的情欲(sex feelings)。

〈黄色壁纸〉是美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夏洛特·珀蓓·吉尔曼最著名, 并且有人认为是她最好的小说。该文首先出现于 1892 年, 源自作者本身的长期忧郁症, 以及她的医生所开的「休养治疗」处方。〈黄色壁纸〉是对十九世纪英裔美人中产家庭女人被派定之角色的一个有力的控诉。叙事者嫁给一位温良和善的医生, 她是一位作家, 为「神经质的焦虑」所苦, 而她的哥哥(也是一位医生)以及丈夫二人双双决定, 她必须用一个夏天离群索居, 俾便尽量「休息」, 尤有甚者, 「绝对禁止工作」, 直到完全康复为止。她被迫住在顶楼的育婴室里, 那儿窗子装了护栏, 壁纸破了, 地板刮痕累累, 床钉死在地上。她在她丈夫与小姑恒常的「善意」监护之下, 等于是被软禁了。当他们看不到的时候, 她就写作, 但又渐觉得累。同时, 破了的黄壁纸却是愈发引人入胜了, 起先显示了「突然自杀」的怪异形状, 然后, 断颈以及骨碌碌的眼珠子, 最后, 慢慢地, 是那个表层图案后面的「一种怪异挑衅形状不明的物体」。作者明白了, 这

形状不明的物体是一个女人，陷于壁纸之下，她一直在爬，晃动了图案，想要爬出那图案。

有时候我想那后面有许多女人，有时候只有一个，她爬绕得很快，爬得整个图案都在摇晃。……

她无时无刻都想爬穿出来，但是任谁也爬不出那图案——缠绞得很紧。我想就是这样，它才有那么多的头。（页 271）

最后，她决定要帮助壁纸里的女人，开始和她一起在壁纸上又拉又摇，渐渐她自己成了壁纸里的女人。故事的结尾我们看见她满屋子爬行，把自己锁在里面，将钥匙丢出窗外。她的丈夫进来，发现她神经质焦虑的妻子没有被治好，反倒疯了，错愕得晕倒。

吉尔曼的叙事体所控诉的，不仅是她自己被指定的休养疗法，而是婚姻与家庭机制，以及大多数她那个社会阶级的女人所被期待的被驯服于家庭内的妻母角色。（婚姻 / 家庭）模子如此缠人，深陷其中的女人总想往外爬，然而就在爬的过程中，又被纠缠，张着骨碌碌的眼睛断了头。或者，当她们最后终于成功冲破壁纸，付出的代价却是清醒与自由，而就像那叙事者，她们只能动物般地在一间向来惯于局限她们的幼儿房里爬来爬去。在这美国上个世纪之交的一个女性作家的故事里，女性不满异性恋婚姻与布尔乔亚把女性驯服于家庭内，所付出的代价，却是疯掉。

如果说，〈黄色壁纸〉是吉尔曼在世纪之交的美国中产阶级婚姻以及把人驯服在家里的氛围里，对于女人的歇斯底里困境之早期去乌托邦看法，那么，《她乡》也许可以读成是吉尔曼对于同样这一个（美国）「家驯主义」（domesticity）的乌托邦看法，只不过范围扩及整个国家，清除了所有男性的存在与影响，像个共产家庭般地运作，只住着高度文化文明的，极端理性与良善的，母亲与女儿。

《她乡》的叙事者是范戴克·简宁斯，一个美国男人，和他的二位男性朋友到一个莫名的国度，「是到一条大河的千百条支流和硕大的腹地去，地图需要重新描绘，野蛮的方言需要研究，可以预期各种奇花异草和珍禽走兽。」这次探险带来了惊人的发现：一个女人国，她乡。三个男人发现他们彬彬有礼地变成了这个国家「公共保护的對象」及居民，而当他们被迫停留期间，他们学习她乡的语言与历史，试图逃走，但又被带了回来，与三个她乡的女孩发生「性一爱」，结了婚，最后还是离开了她乡，因为泰利·欧·尼可森（老尼克）的性侵犯而被驱逐出境，泰利是三个男人中最属刻板印象中大男人气的性别歧视者，而在性方面具侵略性的。

叙事者说故事的观点是，男人以及所谓的二十世纪初的美国人，对比于一个「去家庭化」的女人之地，或许是有意要被写来挖苦的，而那个女人国的所有女人，对三个美国男人来说，几乎不被认成是「像女人的」女人，在这些男人的眼中，她们似乎颇不具女孩子气。读者被预设为与这些美国男人持同样的女人观与对「女人」的期待：女人应当如何穿着，如何举止，以及她们对男人、工作、小孩与国家的感受。三个各自不同的男人形成一个光谱，代表在「我们的」世界里男人对女人可能的三种不同的态度：泰利是性歧视的「色狼」，杰夫（马格瑞夫）是超一绅士，把女人偶像化，崇拜女人，而叙事者范戴克，他（很幸福地）居于中间，他「从来不太在意女人」，而在她乡，他却被认为是最具魅力的，因为他「像」她乡的女人（「『我们最喜欢你，』索玛告诉我，『因为你比较像我们。』」

范戴克的叙事是用来引介吉尔曼的批评的，她批判了 1910 年代美国所理解的女性气质与将人驯化于家内的氛围。因此，在范戴克多处反省此地「女人」与家乡的「女人」之不同的段落里，其中有

一处说到：

这些女人非比寻常的母职观念统御着整个文化，就我们所谓的「女性特质」则是匮乏得惊人。这立刻叫我想到了我们坚信深爱的「女性魅力」根本不女性，而只是反应男性特质——为了取悦我们而发展的，因为她们不得不取悦我们，但对她们真正自我实现的伟大过程并非必要的。（页 109）

而在一次论及为何在她乡没有家姓的谈话里，

「都没有姓吗？」泰利一脸倨傲的问下去。「没有家姓吗？」

「没有啊，」她（毛黛）说。「为什么要？我们都是从同一根源来的——实际上都是一个『家族』啊！我们颇为简短、有限的历史起码给了我们这点好处。」〔……〕每个人都可以正确追溯到第一位亲爱的首母身上……但每个人知道哪个孩子是哪个母亲的——何必呢？」（页 135）

范戴克发现，女性气质与女人味都不是天生自然的，因为那其实是「男人制造」的，一个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产物，他们的女人以女性气质之名而有的特性，其实却是「男性气质」。这当然是二十世纪女性主义早期最强的论点之一，就是说，性别是社会与文化建构的，而不是天生自然的，性别刻板印象禁锢并局限为生物性别与各种性欲的再现。然而，范戴克的观点，以及她乡的女性主义，她同样背负着时空脉络的限制，1910 年代（时间）的美国（空间），它们是在彼时彼地被制造的。因此，只是宣称女性气质是「男人制造」的，而不进一步陈明说，并非有个「男人」在背后制造，因为「男性气质」是个不断演进的建构，其意义与效应随着可叙说的历史过程而变动，若不说明这一点，而仅止是说女性气质为男性所制造，那就是再次具现了生物性别先于社会性别（再现）。当这篇小说极力将一片好女人与强女人的土地（「强健之民」）完美化时，事实上获致的效果却是具现一个美好的，起源为女性的「妈妈—性别」，这个国家

社会是一个打理得完好无缺的家（或一个公园，一座花园）的缩影，立基于单性生殖的单一理性，「处女所生」，亦即，是一个女性种族的无性繁衍。而这也就是她们没有姓氏的理由。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全国都始于首母，不会与其他较低等的种族或品类有异种交配的情况，唯有严格的自我控制与自我管理，俾便对质与量都作有效的掌控。

这里「质」所指谓何？有几点，其一，这个女人国的女人，都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女人，维系着可以想见的最高标准的干净与秩序，而这回不仅在家庭的层次，而更及于国。「没有尘土」、「没有烟」、「没有噪音」，「每件事物都美丽，井然有序，干净俐落，还有家最令人温馨的感觉漂浮于上。」但这个「家」却不是任何一家：因为在世纪之交的美国，一定有各式各样不同收入，不同人种的家。不，这个国度及其子民，在初识之时，显然令叙事者范戴克忆起某种感觉，「在回忆里一直往回追溯，终于找到了。」

小时候经常卡在绝望的错误里，尤其在我短小的双腿使尽力气奔驰，却仍然无法克服上学迟到的时候。……杰夫也感觉到了，我看得出来。我们觉得像小男孩，非常小的男孩，在和蔼的女士（gracious lady's）家里淘气被抓到。（页 46）

对三个访客中的二位来说（这二位是最相信她乡的独特气质，而最后又被同化的），她乡令他们忆起「优雅女士的家」，在那儿访客立即变成小孩因淘气被抓到。他们被抓到了，但没有被处罚，只是被施以再教育，而且至少对这二位来说，是成功地被再教育了。唯一没被革新的是泰利，那他就必须被赶出家门，赶出国门。重点是，这是个「优雅女士」的家，一个拥有资产（中产阶级）与教养（文化资本，「文明的」）的女人——显然是本世纪之交美国人想像中与社经地位上的资产与教养。因此，「她们的国家和荷兰厨房一样

整洁」而道路「每个弯弧、曲度、沟渠都完美的和欧洲最好的一样」。这里比较所用的语汇，不仅只是叙事者知识与意识视域的函数，而是，这个叙事体本身，小心翼翼地记载着她乡与其种族发源地欧洲「最好的」相似之处。

她乡源于二千年前，至少，对范戴克来说，「我（范戴克）毫不怀疑她们是雅利安种（Aryan）的，一度曾经接触旧世界最杰出的文明。她们是『白种的』，但因为长年暴露在太阳下和风雨中，比我们的北方种族稍微黝黑些。」之所以需要对额外的黝黑作说明，说那黝黑并非由于种族，而断然是环境因素，透露出这篇小说参与了世纪之交英裔美人种族与殖民论述。⁴她乡批判了美国在社会性别上是男人制造的世界，却隐然同意同样一个世界里的种族与社经秩序，并且与之共谋。因此，环绕她乡周围的野蛮部落，当然是「低等的」种族与文明，要与之保持安全距离。她们知道「下面那些朦胧的林子里住的野蛮人，」同时也知道「其他区域文明存在与发展。」而当三位访客初次到临时，「她们立刻接受（那双翼飞机）是其他地方高度文明的证明。」那么，偶尔闯进的更「野蛮」血统的访客将会如何？小说里没有明说，只是让我们猜测他们「消失」的方式。因为照起初带领范戴克一行人的向导的说法，那些冒险去到这片女人地的人从来没有回来说过。当然，范戴克不一样，他有高等的「血

⁴ Elizabeth Ammons 曾引 Susan S. Lanser ("Feminist Criticism, 'The Yellow Wallpaper,' and the Politics of Color in America," *Feminist Studies* 15, Fall 1989, 415-41)的文章，说明对于〈黄色壁纸〉的女性主义阅读，其实奠基在民族、阶级但最重要的是种族的盲点之上。Lanser 认为〈黄色壁纸〉体现了当时吉尔曼和美国白种中产男女人士共有的（华裔）种族歧视，这份歧视就烙印在小说通篇的「恐怖黄色（壁纸）」上。Elizabeth Ammons, *Conflicting Stories: American Women Writers at the Turn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39-40.)

统」与文明。因而也就享有他特有的温馨接待与之后的「教育」。

不止是「低等」访客的消失引起我们好奇，关于人口方面的「品质」、思考方式、生活模式、「全体一致无异议」的维护，究竟如何？

「她们拥有最平和的脾气，最完美的耐心和好性情——最令人赞赏的是她们根本不会恼怒发火。」有个线索隐藏在对猫的管理里。就是说，很奇怪，或者说是可以预料得到的，（端看一个人是否来自这样一种文化与时间、空间：会由一种特定的动物联想到一种特定的性别，）这竟是一块只有猫而没有狗的地方，「国家内没有野兽，连被驯服的也很少。」

你们猜猜这些奇女子把猫弄成什么样子了？经过漫长和谨慎的选择与淘汰，她们培育了一种不会大声叫（sing）的猫！这是事实。这些可怜的笨兽肚子饿或要开门时，只能发出一种唧唧叫的声音或呼噜声，还有对幼猫发出各种母性的声音。⁵
（页 9415）

一个类似的办法是用在她们自身的繁衍上，一种对于合宜的妈妈种的名副其实的培养。当处女要生五个女儿，个个女儿将又成为五个女儿的母亲，这状况将导致这个小小的花园国有人口过剩的威胁时，将会如何？她们将如何控制她们自己的生殖？而维护产品一致的品质？

……她们一起坐下来谘商，想出解决之道。她们是脑筋非常清楚，非常聪明的思想家。她们说：「经过我们最大的努力，我们的国家只能扶养这么多人，这种水准的和平舒适健康美丽和我们要求的进步，很好，我们就生这么多人。」

就是如此，她们都是母亲，但不像我们的受孕是无助的，不

⁵ 原文中的"sing"由上下文看似乎影射猫类所有较「粗鄙」、「兽性」的发声，包括春叫。

是出于自愿的，被迫填满，甚或过分充斥在土地上——每一片土地！然后看着她们的孩子受苦犯罪，随之死亡，恐怖的和别人争斗。但在有志做人的制造者脑海里……她们是在做人——她们做得的确很好。

接着是一段「淘汰优生学」的时期，这一定是骇人的牺牲。我们一般都愿意为国家「奉献我们的生命」，但是她们必须为国家弃绝母职——这的确是她们最难做到的事。（页 12415）

如果生殖真有可能透过控制「内心深处强烈要求孩子」的自我牺牲而维护，这种维护与生产的品管就更困难而需要迂曲委婉的解释。

然后她们开始涉足改进人口的品质——既然她们的数量已经受到限制。这项工作已经持续不断的进行了一千五百年。你还奇怪为什么她们是好人吗？

生理学、健康学、卫生学、运动养成——这些工作早就完备，她们几乎全然不知疾病为何物……她们很干净，活力十足，一直拥有最佳的照顾和完美的生活条件。（页 129）

那么那些不是完美的「养得干干净净」「活力十足」的人，或者，像泰利所说的，「我们不知道她们如何处置罪犯、有缺陷的人、老年人。」很简单，正如索玛告诉范戴克的：

「当我们开始——即使从那特殊高贵的母亲开始——我们继承了她背后漫长的种族记录，它们不时蹦出来——够吓人的。但这——没错，已经快六百年了，我们没有你们所谓的『罪犯』。」

「当然我们的首要之务就是利用训练和一种把最低等的类型排除。」

「育种排除？」我问。「怎么可能？——妳们都是自体繁殖。」

「如果女孩子表现出不好的质性，但仍然愿意分担社会责任，我们就请求她放弃母职。幸运的是，有些最坏的典型无

法生育。但如果缺失是不成比例的自大性格——这女孩显然知道她有权利生育，即使如此，她的孩子还是比其它的好。」⁶

「我懂了，」我说。「然后她可能会以同样的精神教养她们。」

「我们向来不准如此，」索玛安静地回答。⁷（页 14516）

《她乡》写作与出版的 1910 年代，这种不让她乡「最低级」的子民育种的论述，这种对于「坏品质」的女孩诉诸「社会责任，」使得她自我牺牲以抑制生殖，带走那些太具自我权利意识（「不成比例的自大性格」）者的小孩，使得那些小孩不致于复制她脱轨的母亲「不成比例的自大性格。」这里的逻辑，与稍后的 1920 年代兴起的法西斯主义逻辑，一模一样，干净、秩序、文明的欧洲她乡，就是这么提醒了她的访客们。也正是这同样的逻辑，驱使美国与澳洲晚至 1940 与 1950 年代实施的社会福利政策，夺走穷人（在美国是如此）与原住民（澳洲）的小孩。次等落后的阶级与种族的繁衍必须积极被阻止，以保证一贯的品质，人民整体「一致无异议。」

最让人困惑的，也是意义最不祥的，就是《她乡》里将种族伦

⁶ "Some of the worst types were, fortunately, unable to reproduce. But if the fault was in a disproportionate egotism -- then the girl was sure she had the right to have children, even that hers would be better than others." 「这女孩显然知道她有权利生育，甚至她以为自己的小孩比她人的好。」又，凡引文画线处为本文作者所强调者。

⁷这一段对话中的「含蓄政治」非常清晰，尤其是索玛最后安静简短的回答："That we never allowed"——「向来不准如此」中的「向来」和「不准」铭刻着长期安静的言辞禁忌和对于不符合标准美德的女孩的心里身体规训。其中象征暴力和心里强制让人想起吉尔曼在〈黄色壁纸〉中，对于父权家训主义的控诉。这个父权家训主义也充满了含蓄的，隐藏在医学权威中的暴力效应。至于「含蓄政治」，请参见本书中刘人鹏、丁乃非的〈罔两问景：含蓄美学与酷儿政略〉。

理与性别化的生物性接合起来。生育控制意在达成女性种族的纯净与良善，而在少数失败的例子里（「不成比例的自大性格」），国家的教育要革新她的小孩，方法是将小孩从她那在*伦理的—生物性*上有瑕疵的妈妈身边带走。

《她乡》可说是一个例子，示范的是，以单一的性别差异为基础，从「我们的」性别情况（1910年代的白种美国）去想像，发现并同化于一个较高级的「异类」（国家），这种叙事的局限性。这个「异类」只是倒转了「我们的」性别逻辑的价值与景况，然而却复制了「我们的」（白种美国的）社会里几乎所有其他不平等的权力协调机制。她乡因而被想像成一个纯粹白种人的国家，居住着「强健之民」，而她们恰好都是女人。单一性别其实只是她们历史的侥幸，具现为一种宗教，民族精神与律法。除了一点之外，这个国家对于二千年后的第一批男性访客来说，完全是他们认得出来的。这是一个干净、治理得当、教养得好的一个公园，一座花园，一个公社，全是女人，然而白种人中产阶级「优雅女士」的领域与天堂。

吉尔曼在世纪之初对于一个女人国乌托邦的异象，是一个以种族阶级为本的社会秩序意识型态，这个特点在那相传的起源，她乡所谓的「性—情感」之几乎不存在，以及社会—生物性的所谓隔代遗传（*atavism*）上，最为清晰。

不但无法利用异性相吸的感觉，这种概念根本不存在。因为二千年来废除使用，所以留下极少的直觉。但我们必须记住即使有些人拥有这个隔代遗传的特例，还是往往被剥夺母职。（页 162）

女人作为母亲与女儿，她们只是姐妹与朋友。就像她乡的猫儿，女人不「唱歌，」她们不自慰，她们没有性，她们不会欲望彼此，或

者欲望任何「异类。」当三个「文明」的白种男人终于出现在她乡，她们只认为是「面对一个机会，可以跨越大步，改变整个情势，逆转回到早期自然的双性社会秩序。」

事实上，她乡的「历史」起源是阶级、种族冲突与争战，表现在性别上，也由性别而解决。她乡原来与别的任何国家没有两样（在西方文明的记忆中），有船只，贸易，军队，国王，和邻国（野蛮人？）的一连串战争之后，迫使她们来到现今占有的一小块区域。她们开始了多夫妻制，「双性的」雅利安种族，拥有奴隶，「像那个时代其他的民族一样，」但是，当（与他族的）战争与火山爆发截断了她们通往大海与外界「文明」世界的唯一出路，

除了奴隶，非常少数的男人存活下来。这些奴隶伺机群起叛变，杀害仅存的主人，连小男孩也不例外，也杀害老妇人和母亲，意图霸占所剩的年轻女人和小女孩。

但这一连串的灾祸对这些忿恨的处女太难以承受，她们人数很多，但这些可能成为日后的主人翁的奴隶为数很少，所以年轻的女人没有屈从就范，迫于绝望杀死了征服她们的人。……

当时真的除了一堆歇斯底里的女孩子和一些年纪较大的奴婢，这片美丽的高地花园没有人存留下来。

这大约是二千年前。（页 10314）

重要的是，这样一则「起源故事」所回忆的，是十八世纪美国移民中奴隶拥有者以及他们的女人与妻子的恐惧与幻想。这些恐惧特别是对于异族通婚的恐惧，对于奴工阶级反抗的恐惧，以及奴工阶级对于他们主人的女人们之性侵略的恐惧。因此，一场二个阶级之间的战争，在隐喻上变成二个性别之间的战争，连带的是一些「忿怒的处女」与一些跟班的奴隶女所建立的国度，低等从属的阶级终于

被化约，并且也被记忆成是那低等的「性，」也就是具有所谓隔代遗传性（*atavistic*）的「性—情感」（*sex feelings*）。这种低等阶级沦为性（兼指社会性别与性欲）的倾颓，在三个种族上与阶级上都属高等的男人莅临时，面临了改变。用范戴克的话说，她乡的女子知道三个「探险家」到临时，她们脑中所想的是：

来自另一国度，可能是男人，显然高度文明，无疑拥有非常宝贵的知识。或许危险。尽可能抓住他们，如果需要就驯服或训练他们。这可能是我们国人重新建立双性社会的机会。

这个例子中的驯服与训练完全没有根除这三个雄猫想要「唱歌」的欲望。因此，这三个男人全都向他们所选择的女孩表白了，表达了无法理解的，其实是不必要的与「不自然的」欲望。

对她们而言，长久以来，母职一个高尚的目的就是掌握生活的法则，而父亲的贡献无疑也是为了达到同一目标的另一个方法。她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男性动物的欲望往往漠视亲职，追求的只是我们美其名的「爱之喜悦。」（页 234）

在她乡，性欲完完全全归于生殖，并且没有了生物性的生殖，性欲就根本不存在。对女人来说，那是一种生物性的「内在驱力，」理想上与实际上都透过孕育生殖而完全得到满足。（在某一点上，依拉朵怀疑地问范戴克，「你是说……你们的人结婚后，不管是不是季节，马上就做起来了，根本没想到小孩吗？」）然而只有在男人才有一种未与生物性生殖相连的性欲望。这是一种隔代遗传的特质（*atavistic trace*），长久以前来表现在她乡（低等的）女人身上。这种女人，就像艾黎蒙（泰利的「配偶」）所拥有的，依范戴克的说法，就是「隔代遗传比较突出的女性特质，一直隐藏未现」，如果显明了，她们「往往会因这种特质而被剥夺母职。」在《她乡》中，性欲因而是生物性别（男性，女性）的一种原始的特质，最好透过一个漫长的生

物控制过程将它拔除。⁸

但是，有一种男性的性欲望是被接受的，那就是范戴克对依拉朵的。依拉朵来自长远的超母亲（这正是纳粹德国所用的词）家世，是「高等的。」她没有泄露任何隔代遗传的迹象，相反地，透过长期的交谈，她能够对范戴克造成一种升华的转变的影响，直到他发现他对她的性欲变成了他所谓的「往上升华，非常的崇高，不是往下堕落。」

我发现往上升华的爱终究是绝佳的感觉。给我一种奇特（queer）的感觉，深刻入里，仿佛搅动史前古老隐晦的意识，一种绝对是对的感觉——认为这才是感受的方式。就像——回到母亲身旁。……我指的是一个走失很久的幼儿会有的感觉。是一种回家的感觉，能够干净的休息，安全不失自由，永远有爱围绕，宛如五月的阳光温暖，不似火炉或羽毛被烫热。一种不会令人心烦，不会令人窒息的爱。（页 240）

男（异性）恋欲望升华为一种退化 / 乱伦的对于母亲的爱与温馨的欲望：她乡竟如此想像一个未来可能的「回归」于「自然的双性秩序」。（至于这类想像中的酷异变奏，请参本书中白瑞梅〈从他乡到酷儿乡：女性主义乌托邦渴求之同性情欲流动〉）

1997 年初，二位女人死于暴力，一位长期参与妇女运动与反对政治，另一位则是一个单亲妈妈的女儿，后者的母亲是全国知名歌星与演员，据说也是台湾总统的最爱，激起了全国性的对于女人与

⁸ 「性相（sexuality），是吉尔曼对于父权的终极想像。」「当吉尔曼在她乡中铲除了性别差异，吉尔曼却延续了对于性的高度压制的想像看法，甚而宣称驯伏了性相，才使她乡的女性得以建一个她们设计的国。」 Jean Pfaelzer (*The Utopian Novel in America, 1886-1896: The Politics of Form*, 156-157)。性相作为 sexuality 的翻译，来自朱伟诚〈台湾同志运动的后殖民思考〉《台湾社会研究季刊》30，1998 年 6 月，55 页。

小孩安全的支持。这项支持，以及一连串的抗议游行，激励了台湾都会中心大多数的人口。妇女与小孩的日常人身安全，从这二个被强暴与被虐待的女人身上表现出来，获致一种普遍的神话性的价值。台湾中产阶级都市社会达到某种共识，似乎也为在地的女性主义者与妇女运动长期奋战的议题背书了。某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国家终于觉醒了，知道她在公共安全议题上缺乏性别意识，从今将可以在地方及国家的层次上，开始启动性别平等政策，以弥补过去的不足。从这个观点看，连结女性主义与国家的时刻已经到临。似乎很清楚的是至少在这个议题上，女性主义将可获得中产阶级都会人口的支持。

当松散地构成台北以及台湾其他各处的妇女运动的不同妇女团体之内与之间开始讨论，关于国家与女性主义之间的新的联结，其间各种的矛盾冲突与策略时，台北市长与市议会的反色情政策，涉足制定了一个象征性的暴力，暴力对象是 129 位公娼，她们在台北市领有工作执照，受合法保障。一夕之间，她们都变成「非法的」了，这些性工作者，大部分是文盲的单亲妈妈，平均年龄四十岁，独立抚养小孩，有些甚至要抚养家庭。为了限制社会福利金的取得资格，补偿津贴给予的形式是惩罚性的监护，以及强迫性的循规蹈矩。这些性工作者组成了自救会，并且走上街头抗议，她们蒙面，作为社会对她们工作污名化的一个可见的表征。对于这项政策，使得她们的生计成为不合法，甚至更危险，较前更不能在身体与经济的蹂躏上受到保障（因为这些大多数是文盲的妇女，有些无可避免的仍得要继续从事性工作，就算不合法，仍得要做），她们的要求是两年的缓冲期。她们的诉求主要一直为妇女工作团体所支持，然而那些自 1997 年初抗议行动以来，已被视为主流的台湾妇运团体，却是一直保持噤声沈默，某些场合宣称她们不确定，感到困惑，或者

就只是一味地坚称（不反娼但是更）反性产业。

虽然这个议题正也是关乎女人在公共领域的人身安全与福利的。但这一次，要求对自己的身体、人格以及工作要有法律认可之保障的这些女人，她们的工作涉及性服务的交易，就被认为在**性别**上造成问题与疑虑。包含了（女）性性的身体部位的交易与服务的工作，在这种观点之下，被认为是反—女性，或者是反—女性主义者的。这里的含义似乎是，女性生殖的身体部位，必须保留给私人使用、交换与流通，它们不能进入公共交换领域，也不能变成一般货币经济的一部份。没有问到的问题却是，相对于国家机器与公共领域，究竟要在哪里，或者如何，定位家庭、女性的性相、以及「家驯主义」。其实，女性的生殖部位难道没有在婚姻与家庭的脉络里被交换、买卖、管理，并且变成专有的财产？女性主义者与妇女团体说，女性的性与生殖，不能只是私领域的事，强暴、性侵犯、婚姻暴力与离婚都必须成为公共议题与法律事件，然而，同样的妇女团体，在娼妓女人的性以及生殖上，却主张仍必须保留为准—神圣的私人领域，（公娼不能结婚），保留为法定的异性恋繁殖目的，不能付诸公共讨论、使用与交换，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货币经济却又无所不在了，我们该如何了解这现象？

《她乡》其实提供了一个解答的线索。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女人的性与生殖器官才必须尽一切代价加以保障与护卫，那就是，合乎一种特定的可以被接受的关于女人的定义（她配称为这样一种性别。）因此，在《她乡》里，那些不合于她乡的女人味、母职与女孩儿气之理想的女人，就被认为不能作为社会与生物性繁殖的候选人。而在台湾，当国家机器与女性主义开始要接触并且结盟的时刻，在色情与娼妓等具爆烈性与分歧性的议题上，我们发现，一种

关于「女人」的论述与定义出现了，那显然是基于阶级的，而且是性化与性别化的合乎阶级价值。回想一下《她乡》中不唱歌的猫，性欲在反色情论述中，简直就是一种男性（异性恋）的特质，而拥有此特质的女人就有与敌人共枕之嫌。女人在这样一个危险而暴力的父权时代最好不要唱歌，同一逻辑又出现了。或者，她们应该以一种全然难以想像的，认不出来的，而且，最好是完全沈默的方式唱歌。否则，一个人就很难分辨出倒底是男人在唱或是女人在唱。然而，对于靠唱歌维生的女人来说，她们怎么办？还有，那些独自唱歌，但喜欢把它说出来的女人？或者，和女人一起唱歌的女人？和男人一起唱歌的男人？这些问题，就像在她乡一般，被认为是比较不重要的。这些问题比很多事情都不重要，比方说，母职，育儿，住宅附近以及国家的清洁与秩序，一般社会的彬彬有礼等。

正是这种价值的等级本身，是需要被质疑的，而在《她乡》中，这反应为它的时代、空间以及眼界的产物。简单说，就是 1910 年代《她乡》的写作，与 1990 年代台湾妇女团体之间关于娼妓与色情的论战，其间的种种不同时空的历史，让我们得以在她乡中译本出现的此刻、此地看见准法西斯主义，更精确地说，是性的法西斯主义——在特定历史时刻与社会情境下书写出的自嘲为女性主义的乌托邦里，以性 / 别优位之名，隐含偷渡其阶级 / 种族偏见。这也使得我们不得不面对，女性主义论述可能预期并参与在最狭隘的社会与种族再想像中。

而同样的这种价值等级，复制了羞辱与污名。从事性工作的女人，或者在台湾巨大非正式性工业里工作的女人，年纪太轻的女人，情欲上爱女人的女人，与女人有性关系的女人，和女人及男人都有性关系的女人，这些女人，都还没有变成（或者太少会变成）女性

主义论述或是女性主义关心的主体。她们经常是事后才被想到的，或者，更糟的是，施恩式的同情或直接的藐视所看不见的对象，（隐含的意思是，她们应该保持沈默，不要让人看见。）因此，在 1997 年 9 月 27 日的台北，为删减教科文预算而走的游行中，环保团体中的一些女人，大声苛责走在前面的蒙面的合法的性工作者，「她们以为她们是谁啊，还有脸走上街头！」

这也是女书店要出版夏洛特·珀菁·吉尔曼的〈黄色壁纸〉以及《她乡》之中译本的脉络之一。而这也是及时出版「黄色壁纸」与「她乡」中译本可能的阅读方式之一。如果以二部作品写作的时间顺序来阅读，这二个故事寓言了一个可怕的法西斯原型的未来方向，而这正是台湾的所谓国家女性主义向前迈进的未来。对于那些极不同于当前被大家了解与接受的「女人」的女人们来说，尤其是如此。人们忘了，那些当前被了解与接受的女人，她们参与缔造了当下被逐渐接受的「女人」的新意义，这是历史过程的产物，也必然会在历史过程中，不断衍异。更正面一点说，如果「女人」不要以迈向某一种乌托邦的固定性，以及能指与所指的统一为目标，亦即，拒绝让偶然性的、由历史决定与推动的异象，固着于一种社会的性别及性，不允许任何越轨或例外。吉尔曼的两个故事，必须用来预警那可能发生，但不应该发生的事。唯有如此，「女人」才可能持续是动态的，时有分歧，「身为女人」与「变成女人」的意义与情况永远在矛盾地转变与扩展，至于转变与扩展的程度与样态，我们不能，也不应该，从此时此地，这些在历史上与时间上被性别化了与性化了的身体上，预作确认。因为，

……假如我们仅只是以为，社会性别的区分是人类认同的根本，那我们既不能了解社会性别区分的全概性的权力作用，也不能明白，这样一种权力作用无可避免会服务的真实利

益。⁹

參考書目

- 朱伟诚。〈台湾同志运动的后殖民思考〉，《台湾社会研究季刊》30，1998年6月。
- 张惠娟。（典范兴替——论吉尔曼的《她之乡》）第三届美国文学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选集：文学篇。单德兴主编，台湾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3，205-207。
- Ammons, Elizabeth. *Conflicting Stories: American Women Writers at the Turn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Armstrong, Nancy. *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Nove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Barr, Marleen S., editor. *Future Females: A Critical Anthology*. Bowling Green: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Bartkowski, Frances. *Feminist Utopias*. Nebraska: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9.
- Gilman, Charlotte Perkins. *Herland and Selected Stories by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New York: Penguin, 1992.
- Gilman, Charlotte Perkins. *Herland*.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9.
- Pfaelzer, Jean. *The Utopian Novel in America, 1886-1896: The Politics of Form*.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4.

⁹ Nancy Armstrong, *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